

戴震体认语言观初探

殷 猛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黄山

收稿日期: 2021年10月8日; 录用日期: 2021年12月1日; 发布日期: 2021年12月8日

摘 要

戴震的体认语言观包含在其音转学、语义学与解释学中。戴震的体认音转学表现为“音近义通、以‘体’为本”，身体结构与生理运动直接参与意义的生成与构建，构成本体论层次的体认；戴震的体认语义学表现为“察触悟感、体情遂欲”，构成认识论层次的体认；戴震体认解释学凸显“大精其心、以心相遇”，构成一种实践论层次的体认。戴震体认语言观的探究对推进体认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戴震, 体认语言学, 语言观, 音转学, 语义学, 解释学

Preliminary Study on Dai Zhen's Embodied-Cognitive View on Language

Meng Yin

FLD,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Received: Oct. 8th, 2021; accepted: Dec. 1st, 2021; published: Dec. 8th, 2021

Abstract

Dai Zhen's embodied-cognitive view on language can be discovered in his phonemics, semantics and hermeneutics. Dai Zhen's phonemics is characterized as "similar sounds, associative meanings" and "being based on the body". The bodily structure and movement directly create and construct meaning, which constitutes the ontological embodiment. Dai Zhen's semantics is featured as "experiencing, contacting, enlightening, and feeling", and thus "reasonable desire should be satisfied", which makes up the epistemological embodiment. Dai Zhen's hermeneutics has the character of "enriching and deepening the mind", which formed as the practical embodiment. The study on Dai Zhen's embodied-cognitive view on language is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localized study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words

Dai Zhe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View on Language, Phonemics, Semantics, Hermeneutic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王寅提出的体认语言学[1] [2]以西方哲学第四次转向中的后现代思潮为背景[3]，以弘扬中国后语言哲学[4] [5]为旨归，批判性继承、发展了滥觞于西方的认知语言学，致力于实现一种语言(哲)学中国本土化理论建设。体认语言学遵循“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体现语言研究中的“互动体验”与“认知加工”，彰显唯物论与人本观。当用体认语言学研究的“本土化”“唯物论”“人本观”等关键词回溯历史时，中国近代史上乾嘉时期的一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便自然纳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提出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哲学方法论与中国后语哲“语言入、世界出”的研究进路深度契合；他批判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蕴含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人性论与人本观；他在实证考据学与经学解释学中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就是被梁启超、胡适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先驱者”的戴震。戴震语言(哲)学所体现的唯物主义维度与人本观(人性论)近年来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从体认语言学之体认维度来探究戴震语言观尚待挖掘。本文尝试从戴震的音转学、语义学、解释学中挖掘其体认性，以进一步彰显体认语言学的本土特色，为“希冀构建体认语言学的本土之壤和中华之根”([6], p. 152)尽锦薄之力¹。

2. 音近义通、以“体”为本——戴震的体认音转学

开拓体认音转学研究的是王寅[7] [8]，他将程瑶田的著作《果羸转语记》译成现代汉语，从“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核心原则出发探讨该著作中同源词、声训法与音义学所蕴含的“声随形命、字依声立”的体认机制以及“音近则义通”的体认理据，反思了索绪尔语言任意性的局限，倡导学界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语言理论，形成中西合璧、携手并进、互相融通、相得益彰的语言研究新格局。

戴震与程瑶田是同时期人，同为徽州老乡，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也同师事江永。程瑶田从戴震的音转理论中得到启发，“将语转理论在同一义类的名物词演变上做了初步探讨，写出《果羸转语记》”([9], p. 202)。戴震的体认音转学与程瑶田的体认音转学相比，有音近义通的异曲同工之妙，也有其以“体”为本的独特之处。

王寅主要讨程瑶田转语中的体认机制，本文采用“音转”概念，而非“转语”，有三个原因。首先，两者的范围不同。“转语”作为一个名词，其涵义是“语音发生了变化的词语”([10], p. 2)。扬雄的“转语”主要包括方言词与古今音变的词语，当代学者将转语视为同源词中的转化词(derivation)，是“声音转化的词语”([11], p. 65)，因此，“转语”是音转的结果，转语包含在音转的范围之内。其次，澄明概念的需要。与“音转”类似的术语概念繁多复杂，例如转语、音近、声近、声如、语转、语声转、声之转、失读、声相近、音讹、语讹、读为、某之为言某、一音之转、一声之转、某转音为某、合语、俗

¹张智义在该文的第五部分提出“理学和心学的砥砺与会通——体认语言学之于形式语言学”，呼吁体认语言学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应该将知行合一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震哲学正是在批判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本文是对张文的“接着说”。

转、变转、通转、方音递变、声之通借、合声、对转、叠韵相转、异韵相转，等等。为了避免概念使用上的混淆，我们用“音转”来统称“音变义存”这样一类语音现象。第三个原因在于，戴震虽然将“转语”作为其《转语二十章序》的标题关键词，但《方言疏正》不再使用“转语”来说明音义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用“音转”来统一指称《转语二十章序》以及《方言疏正》中出现的“正转、变转、一声之转、声微转”等术语。

戴震音转学中的转语和“因声求义”与程瑶田具有相似之处，均是音近义通的体现。例如，在《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中，戴震用“转语”方法进行类推：“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如‘胡’字。……又因‘胡’、‘遐’、‘何’一声之转而‘胡’、‘遐’皆从为‘何’……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12], p. 55)。

戴震明确提出“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12], pp. 2523-2524)。我们首先要理解“同位”“位同”这两个戴震音转学的关键概念。戴震根据发音部位，把声母分为五类，处于同类中的声母即“同位”，而每类声母根据其发音方法又分为四类，属于相同发音方法的声母即称为“位同”。相对于“同声”概念，“同位”概念具有基础性、始源性意义；同样，“位同”概念是奠基性的，“声变而同”概念是衍生性的。没有“同位”就没有“同声”，没有“位同”也就不存在“声变而同”。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戴震“同位”“位同”概念的基础作用，看不到音近义通的前提条件，从而容易将音近义通现象扩大化，混淆了音义关系任意性与理据性(像似性)的界限。其原因与西方语音学(phonetics)与音位学(phonology)的明确分野有关，前者研究人类语音的发音特征与物理特性，而后者将前者所研究的实际发音(音素, phone)进行抽象化(位素, phoneme)，再探讨意义(meaning)生成，现实的、活生生的语音不参与意义的建构。与此相反，戴震的音转学直接探究音义关系，将西方意义上的语音学与音位学统一起来，让同位、同声与位同、“声变而同”共同参与意义构建，形成音义关系。

因此，戴震重视对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的论述。在《转语二十章序》中，戴震说：“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13], p. 92)。“大限五”，即喉音、舌、牙、齿、唇音，“小限各四”，即清、次清、次浊、浊四种发音方法。

戴震的“同位”“位同”为音义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人首先作为生物学意义的人而存在，人具有发音器官，并按照发音部分进行发音。发音自然是以我们的身体为基础，这就是戴震音转学以“体”为本的含义。具有发音器官与身体生理运动是基础本体论意义上的体认基础。我们的身体结构与生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语言与思想([14], p. 7)。

人的身体结构与运动直接参与意义的建构，成为人发挥体认功能的基础性前提，是始源性意义上作为本体论的体认层次。

3. “察触悟感、体情遂欲”——戴震的体认语义学

语义学的体认性如何确定？什么样的语义学可界定为体认语义学？我们认为，只要是基于对现实的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即使探讨抽象实体的意义，也可能是体认性的。例如抽象实体之间的方位关系是抽象的，但体认者可以把具体实体的空间特征赋予抽象实体，使抽象实体具有空间性，从而具有体认理据性([15], p. 20)。另外，所获得的语义，只要是人类通过身体与外界现实互动获得的体验，既牵涉到身体所处的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也牵涉到人的身体的语义，就是体认语义。当然，身体既可以是物理、生理之身，也可以是延展性的心理和社会文化之身，即拓展了的多维之身([16], p. 50)。

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是其治学纲领。由“字”通“词”涉及如何理解语言的语义学问题，而由“词”通“道”则涉及如何用语言诠释世界的解释学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戴震是如何由“字”通“词”的？戴震从“字”到达“词”的通道或途径是什么²？这一语义学问题可以还原为这样的问题：戴震是如何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的？

为了解决这一语义学问题，我们聚焦于体现戴震朴素语义学的最重要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这部著作集中探讨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 11 个字词的涵义，成为戴震所说的“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以“理”为例，戴震对“理”涵义的论述篇幅最多，共十五条，这里仅列举若干论述进行分析。

例 1：“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17], p. 151)

简析：“察之”，即体验之、考察之，就得出“理”是指事物之中的质的规定性。

例 2：“明理义之悦心，犹味之悦口，声之悦耳，色之悦目之为性。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尤美者也，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 ([17], p. 155)

简析：人通过感觉体认世界，形成感性知识，进而形成理性判断。人是理性动物，人也是感性动物。

例 3：“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絮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17], p. 152)

简析：“理”在“情”中，“情”外无理。

例 4：“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 ([17], p. 163)

简析：“理”是自然与必然的统一。自然是必然的前提，必然是对自然的限制。

例 5：“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而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人物以类区分而人所禀受其气清明异于禽兽之不可开通。” ([17], p. 167)

简析：人无论是身体之成长还是道德品性的提升，都要经历一个过程，都要经过后天不断地学习、进步。

戴震为了澄清“理”的定义，“察”之、“触”之、“感”之、“悟”之、“习”之，将其中蕴含的性、欲、情揭示出来，体现“体情遂欲”，而非“存理灭欲”。由此从对现实的“体认”出发，实现“心之所同然”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揭露了宋明理学的凿空之论。

由此可知，戴震的由“字”通“词”体现了现实 - 认知 - 语言的体认原则，遵循“语言(字) → 现实 → 体认 → 语言(词)”的体认逻辑。体认性作为戴震语义学的方法论发挥作用，体现为一种认识论的体认层次。

4. “大精其心、以心相遇”——戴震的体认解释学

中西解释学均有悠久的历史。西方解释学(hermeneutics)源于希腊语“hermeneuein”，意指“解释(to interpret)”或“翻译(to translate)” ([18], p. 1)，今天在西方泛指与解释有关的理论、学科或实践。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以“述而不作”确立了儒家经典解释的基本范式，到了宋明理学，则以“诠释”义理精神作为解释范式([19], p. 47)。

²李畅然认为，此处的“字”实际上代表着读者理解文本的技能与知识准备，代表着前理解，“词”指的是指经书的句子和篇章。

在戴震“由字通词”这一语义环节的基础上，“由词通道”便进入哲学解释与阐发的解释学视域。在《古经解诂序》这篇文章中，戴震明确指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诠释方向：“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贤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20], p. 375)，即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

关于“通道”，李畅然([21], p. 317)提出了两种路径：“体认路径”与“文本路径”(见表1)。在他看来，体认路径是直接“仰观俯察”(《系辞》)，通过探究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道”的载体的“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之路；文本路径就是“读经”之路，因此对“由字以通其辞”的“其”字非常重视，因为这里的“其”，就是圣贤之经。戴震重视文本路径，其语言学与文献考据造诣精深，且经书为平息争论之最简便的工具，而现实“体悟”则各人各异，难以达成共识，况且在戴震看来，通过文字以通经书是“以简驭繁”之道。

Table 1. Two paths of seeking the Tao ([21], p. 327)

表 1. 求道的两种路径([21], p.327)

方法论路径	宗旨	基点	关注点、标的物	成果形态
体认	随处体认天理	世界	道、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
文本	文本主义	经书文本	经书主旨、作者眼中的道	语文学和诠释学

一方面，李畅然对“体认”做了狭义的理解，将体认界定为个人的体悟行为。实际上，“体认”是一个多元化概念。从体认语言学视角看，“体”即“互动体验”，重在身体力行，而“认”即“认知加工”，“体认”即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唯物论立场，又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唯物论与人本观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探讨由“字”通“词”这一语义学环节所提出的问题一样，戴震从“词”到“道”的途径是什么？“词”如何达“道”？戴震在《春秋究遗序》中说：“读《春秋》者，非大其心无以见夫道之大，非精其心无以察夫义之精。”([20], p. 381)就是说，在“词”与“道”之间，戴震主张“心”作为由“词”通“道”的途径。通过对“大其心”“精其心”的强调，戴震高扬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中的主体性，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内容通过“心”进入解释活动([22], p. 114)。这里戴震的“大其心”“精其心”蕴含了他对民生多艰的经历与感受，对苦难民众的同情与呐喊。其“心”就是对“道”的体认，实现“以心相遇”与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

为此，我们可以将两条路径统一起来，形成一条体认路径，将“体认”构建为由“词”达“道”之方法与通道，构成“语言(词) → 解释者 → 体认 → 道”的(生活)实践体认逻辑。这里的“体认”作为通达天道与人道之途，构成一种实践论层次的体认。

5. 结语

从王寅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 - 认知 - 语言”出发，我们从戴震的音转学、语义学、解释学三个角度，将戴震的体认语言观纳入研究视野。戴震的体认音转学既包括与程瑶田相一致的“音近义通”，又包括体现戴震音转学特色的“以‘体’为本”，人的身体结构(发音器官)及生理运动直接参与意义的生成与构建。戴震的体认语义学以对现实体察、感触、体悟、以情挈情的方式表达了体情遂欲的诉求。戴震的“大其心”“精其心”在“词”与“道”之间发挥体认作用，通过对解释主体心智的扩充，来把握古圣贤之道，以达至圣明的境界。

与此同时，戴震体认语言观呈现了本体论的体认层次、认识论的体认层次以及实践论的体认层次。体认“三层次观”是对体认多维性研究的发展，有待进一步验证与修正。

基金项目

本文为黄山学院徽州文化项目：戴震语言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9xhwh007)及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马克思早期的语用转向研究”(项目编号：GXYQZD2016296)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2014, 30(6): 61-67.
- [2] 王寅.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 2019, 16(6): 18-25.
- [3] 王寅, 王天翼. 西哲第四转向的后现代思潮: 探索世界人文社科之前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
- [4] 王寅. 语言哲学研究: 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5] 钱冠连. 后语言哲学之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 [6] 张智义. 试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147-153.
- [7] 王寅. 果羸转语记现代汉语译本及其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 [8] 王寅, 蔡琴. 从MRC认知视野探索《果羸转语记》中的同源词[J]. 外国语文, 2020, 36(4): 65-73.
- [9] 钱慧真. 惠栋训诂研究[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0] 吴泽顺. 汉语音转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 [11] 朱星. 论转语与词源学[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4): 65-73.
- [12] 戴震. 戴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3] 戴震. 戴震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4] Feldman, J.A. (2006) *From Molecule to Metaphor: A 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3135.001.0001>
- [15] 张克定, 张晓. 抽象方位关系的体认理据与编码限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2): 18-23+73+158.
- [16] 覃修桂, 帖伊. 体验的多维性与体认原则[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28(1): 48-56+159.
- [17] 戴震. 戴震全集第一册[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 [18] Porter, S.E. and Robinson, J.C. (2011) *Hermeneu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ve Theory*.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Grand Rapids.
- [19] 康宇.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J]. 天津社会科学, 2012(3): 47-52.
- [20] 戴震. 戴震全书第6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5.
- [21] 李畅然. 诠释学循环的反转——戴震“由字以通其辞”的解读[J]. 文化与诗学, 2013(2): 140-159.
- [22] 邓国宏. 戴震哲学方法论新探——以“解释学循环”为视角的观察[J]. 孔子研究, 2018(2): 107-116.